

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的
理論、政綱、傳統
及其幹部的歷煉

— 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

彭述之

(內部資料編號：40/78)

在十七年前，蘇達寫了「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說中國托派是「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但「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證明僅僅掌握到革命理論而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也不能起作用的，正因為中國不斷革命論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中共）身上。」

我們當時（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對上述蘇達的指責和批評，寫了「對蘇達批評的批評」以回答他，指出：「如果依照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方法，人們也可以同樣說：正因為『世界革命』（不斷革命的最高發展）的信徒，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幼稚無能』，才讓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落在『一國社會主義者』（階段論的發展者）史大林主義的官僚身上！」

我們跟着問：「何以蘇達同志在其『對中國革命回顧與前瞻』，即檢討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得出如此荒謬的，至少是『幼稚』可笑的結論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對像中國第三次革命這樣一個歷史大事變，『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這種奇特事件，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世界規模的條件去尋求客觀的原因，却自限於從中共的『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特別是從中國托派『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即它的『幼稚無能』，來尋找答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驚人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這還不是等於不從蘇聯的落後和孤立（由於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失敗的後果）中去尋求『左派反對派』失敗的客觀原因，而僅歸咎於它『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的『幼稚無能』，是同樣荒謬的主觀主義嗎？！」

我們并着重地指出：要領導一個革命達到勝利，除了正確的政策外，還要有一個革命的群眾黨。一個微小的組織，即令有正確的理論和政策，還是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的。例如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德國共產黨，雖然有「共產黨宣言」的正確理論和政策（宣言最後一部份即指出德國革命的政策），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但還是失敗了，因為當時德國共產黨實在太小了。

中國托派，自一九三一年統一，正式宣佈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直到一九四九年，始終陷於小組織狀態，由於國民黨和日

帝國主義的殘酷迫害，這個小組織好幾次被破壞，趨於解體（見「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所列舉的托派運動六個時期的描述）。在抗日戰爭結束，中國托派有新的發展，但它的黨團員還不到四百人，像這樣不斷遭受殘酷迫害，長期陷於小組織的中國托派，雖然是「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又怎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呢？所以我在「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的結論（D點）中說：「像這樣陷於微小組織狀態的中國托派」，要指責它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是完全不懂得我們運動所處的客觀環境及其遭遇和本身演化的過程，是一種純粹主觀主義或唯心論的武斷，且是極幼稚的武斷。」

上面「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寫成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它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五日，就發表的日期直到現在已經十六年了。但蘇達在這段長時期中沒有任何反應或回答，如果他是誠實的，對自己黨的批評（他承認中國托派是「我黨」），是負責任的，他就必須對別人給他的反批評以應有的答覆或解釋，以表明他自己不是別有用心，蓄意詆毀中國托派。但不幸，蘇達經過了十六年的緘默之後，又大搖大擺地走出來，用同一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方法，大寫其「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這就迫着我們不得不「又一次」寫「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了。

蘇達的「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和「簡評綱領草案」，還只發表三部份，但他聲明還沒有完，就他的第三部份發表的時間（四月）算起到現在已有半年多了，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寫完，我們是耐着性子等待他寫完再說。但國內外的同志們却要求我們給他以必須的批判，以期澄清他的文章所引起的混亂及避免其可能發生的惡果。所以只好就他已發表的三部份給以簡要的批評。

蘇達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部份中，劈頭便說：「中國托派在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我們尚未做出正式的結論）。」

說中國托派在一九四九年毛黨走上政權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這算是蘇達唯一正確的判斷，因為在中國大陸的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幾乎全部被捕，投進監獄或集中營，這等於說，蘇聯的「左派反對派」，在史大林實行特爾米多(THERMIDOR)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是相類似的。但說「這個失

敗的原因和教訓，尚未做出正式的結論」，那就未免與事實不符了。因為說托派「極悲慘的失敗」，便意味着毛派的「極光榮的勝利」。關於毛派勝利的「原因和教訓」，中國托派的代表彭述之，在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上（一九五一年八月）討論中國問題時，曾作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詳細地分析了中共勝利的原因，並指出它的基本教訓，其要點是：

「毛澤東黨依靠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蔣介石的勝利，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條件下所促成的。這種特殊條件的基本點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於極度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之自動崩解，便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衰朽和解體之極端表現。另一方面，史大林官僚依靠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並利用了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空前地擴張其勢力和影響，這便大大地吸引了在資本主義極度衰朽和解體下陷於無出路的群眾，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群眾，這便促成了這些國家的史大林黨特別強大起來，毛澤東黨正是這類史大林黨登峰造極的典型，再加上美帝國主義在當時國際局勢中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而被迫最後放棄了對蔣的援助，即對毛的干涉，同時蘇聯因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在滿州取得了特殊地位，並以此為根據地，給蔣政權以極其嚴重的損害，直接援助毛黨，使後者的落後的農民武裝趨於現代化。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毛黨單純依靠農民武裝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着重點現在加的）

由上面這個結論所得出的教訓是：「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經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不能單靠農民武裝力量，必須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舉行武裝暴動去完成——這一基本觀點，即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譬如在印度，我們仍然要堅持：印度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武裝暴動去摧毀國大黨的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落後的印度順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發展的道路。」

「但同時，我們必須了解：像中共這樣脫離工人階級而專靠農民武裝所取得的勝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後的中國革命運動種下許多難於克服的障礙，我們認為了解這點，對於我們評斷和估計中共所領導的整個運動和我們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着重點是現在加的）

「我們黨對於中共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整個事變估計上的錯誤，便派生出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的估計上的錯誤，以及某些對外宣傳上策略性的錯誤，因而影響我們對整個事變的態度，或多或少趨於消極方面的批評，而低估了它在客觀上的革命意義，這是應當鄭重地予以糾正的，但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我們的錯誤不是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的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

上面的引文，只是從我「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摘錄的要點，在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雖然巴布洛（當時國際的總書記）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他只在背後散佈謠言，沒有勇氣公開反對，而且自第三次大會後，從來沒有人公開批評上述的基本觀念，以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為首的各國支部是同意我對中共領導第三次中國革命勝利的分析、評斷和教訓的。

「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傳到中國後（當然只限於香港）中國同志們的反應如何，我沒有收到領導機關的正式報導，只從旁面得悉（私人信件中），多數同志是同意的，明同志（即已去世的丁）甚至說：「只有『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才能解釋事變的發生和發展」，這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些同志的說法是相同的。至於當時的蘇達看到「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後有何高見或異議，我沒有看到他書寫的文件，不便猜測，但我「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已從「對中國局勢的報告中」引證過上面的幾段話，答覆了蘇達當時所提出的中共勝利和托派失敗的原因。為什麼他置之不理，現在又「舊調重彈」呢？這表明他不是誠實地討論問題，負責地為黨澄清歧見，只是片面地、重複地「大放厥辭」，不斷地在黨內散佈混亂，挑起爭論，製造離心傾向而已。

中共政權的性質和政治革命的任務

關於中共取得政權所形成的局勢，蘇達告訴我們說：

「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前，我黨有一個黨綱，……但……原有的黨綱已被歷史發展超過了，那綱領所提出的革命目標，即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一頁）。

上面一段話中最末一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這是蘇達於無意中透露了他對一九四九年革命所建立的政權的評斷。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首

先我們要問他：如果中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他現在贊成「政治革命」來推翻中共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呢？用「政治革命」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這不是意味着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嗎？我們主張「政治革命」，是推翻中共的「官僚專政」，蘇達是否同意我們這個主張呢？如果同意的話，那麼，中共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時候被轉變成為「官僚專政」了呢？蘇達能明確地答覆這些問題嗎？

蘇達是最愛強調「理論」的，他應當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面，「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其確定的階級內容和歷史任務的。首先，這個「專政」必須由民主方式選舉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如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所構成，以此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包括沒收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如果是落後國家，還要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如土地改革、民族獨立等），建立國有財產制，實行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活動，開始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權果真是「無產階級專政」嗎？假如不是完全盲目，都會看到：中共建立的政權是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權」或「聯合政府」，有如中共自己所宣佈的。雖然，這個政府由中共控制，但絕不能否認，有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代表參加了這個政府的各級行政機關，並且公開宣佈保衛資產階級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所有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難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嗎？如果不是，你怎能說，「無產階級專政已實現了」呢？我們的「理論家」蘇達在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中心問題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已陷於極端混亂的修正主義的泥沼中去了！

當然，說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只蘇達一人，在第四國際的領導層中也有這種說法，這就是巴布洛，他通過克拉克（當時社工黨駐國際的代表）告訴我說：「巴布洛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實行了不斷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主張國外的中國派應當加入中共，即回到大陸去為革命服務」。巴布洛這種見解，後來又表現於他所控制的國際書記局召開的所謂第四次大會（一九五四年）的決議之中，該決議案說：中國不須要建立獨立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黨，以避免妨害革命的發展，意即妨害「無產階級專政」。

至於 我們，自始就堅決反對巴布洛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想，我們認定中共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的政權是一種邦拿巴特式的專政（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我們謹慎地追隨着事變的發展，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刊登於一九五五年初第四國際瑞士支部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評論」），在該文中較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共政權頭五年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各方面的演變後，得出結論說：

「毛黨最可能依照類似東歐所經過的道路爬行，這就是說，在國內外階級矛盾的壓力之下，毛黨將逐步地排除資產階級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取消「聯合政府」，建立其單一政黨所控制的政權，所謂『由人民民主專政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將逐步地合併或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所謂『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中國在實質上將類似於東歐的變態工人國家，果真如此，中國要走到真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將同東歐各國和蘇聯一樣，還須要經過一個政治革命（着重點係現在所加）。

上面所提出的「政治革命」，還是根據中共踏上政權頭五年的事變的演進趨向所作出的「預測」，但這個預測在一年以後便被證驗了，如一九五五年所開始的「公私合營」，及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大會所宣佈的「無產階級專政」，便和東歐各國的變態的工人國家差不多完全一樣了。就是說，在經濟的基礎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財產制」，而上層的政治結構則是「官僚專政」，因而以政治革命來推翻官僚專政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

我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提出上述的「政治革命」主張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它一九五五年八月舉行的全國大會上，通過了「第三次中國革命及其餘波」的決議案，在該決議中肯定說：「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一種官僚專政，必須有一個政治革命去推翻它。」但到一九六〇年，該黨的全國委員會的兩個委員，史瓦貝克和梁恩（即李富仁），在人民公社的煽惑之下，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公社和政制」，在這篇文章中宣稱：中共不是史大林主義的黨，中共政權不是官僚專政，他們引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中共在一九四七—四九年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已改變了它的史大林主義性質，中共的政權絕非官僚專政，因為它沒有秘密警察保衛官僚的特權利益，它是像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府，經過民主方法選舉出的，因此，他們宣稱：「

政治革命的綱領和口號，對中國是無用的。」他們主張用「民主要求的綱領」去改良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受到史和梁的挑戰，又因為對史、梁所引證的事實弄不清楚，要求我寫一篇文章以澄清他們在黨內掀起的混亂。因此，我寫了「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我根據不可爭論的事實，詳細地駁斥了史瓦貝克和梁恩的一切論據，證明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黨，它的政權是類似蘇聯的官僚專政，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摧毀它，并替政治革命提供了一個綱領，從此可以說：

「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前，我黨有一個黨綱……那綱領提出的革命目標即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後，中共所建立的政權是和「無產階級專政」相反的「官僚專政」，所以我們提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這就是「中國托派的新黨綱」。

我們這個「新黨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發表後（見社會主義工黨內部討論公報廿二卷第四期），當時歐洲一些托派領袖，如曼德爾（MANDEL）、弗朗克（FRANCK）和麥丹（MAITAN）等，還保持他們原來反對政治革命的成見，但在文化革命運動的衝擊之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舉行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會時，他們為事變發展所迫，也公開承認「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的必要了。這就表明：中國托派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的主張，已被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公認了。

蘇達對於這個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公認的「中國政治革命」，表示過什麼立場呢？底下一段話似乎是他的立場的表白：「關於革命後的新中國裏面的繼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雖然在一系列的基本問題上（中國新社會的性質、政權的性質、革命任務、對象和動力）……有了一致的確定的見解（正因為如此，才一直維持着某種程度的團結），但這些見解還欠缺一個堅固并為全體同志一致接受的理論基礎，我們同志這些共通見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對墮落後的蘇聯的見解而得來。托洛茨基對蘇聯有深刻精細的研究，他關於蘇聯的革命理論和路線令我們完全信服。我們又看出第三次革命勝利後的中國在本質上和史大林官僚篡位後的蘇聯相同，……但作為黨的思想基礎，這是不夠堅強的，這還帶有很大的信仰成份，還不完全是科學研究

的結果。黨的堅強的思想基礎，必須是對新中國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以及必然的趨勢所做的周密的科學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不但還沒有達到見解一致，而且，這個研究工作根本還進行得很少，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見提出來。在這樣脆弱的基礎上，我黨根本沒有可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沒有可能通過有力的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更談不到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上面一大段充滿學究氣，混淆不清，自相矛盾和幼稚懸想的話，是蘇達的「周密的科學分析」的總結，值得大家注意，但因為冗長和複雜，我們不得不把它分成幾點來給以檢討：

(一) 蘇達所謂的「新社會的性質，政權的性質、革命的任務、對象和動力」，指的究竟是什麼具體內容呢？是否如我們根據社會學的定義所說過的，新中國是「一個變態的工人國家」，它的社會性質是「國有財產制」，它的「政權性質」是「官僚專政」，「革命任務、對象」是「推翻官僚專政」，「革命動力」是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份子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依照蘇達說中國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看來，他的答案應是否定的），蘇達又拿什麼社會學的定義來確定它們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為什麼又說「這些見解還欠缺一個堅固的理論基礎」？所謂「理論基礎」，究竟是什麼？蘇達既然「發現」我們的綱領，「政治革命」「欠缺理論基礎」，為什麼他不負起責來給以修正或補充呢？單做消極的批評，而不做積極的建議，或建設性的貢獻，這便是蘇達一貫的「作風」！

(二) 蘇達說：「我們同志這些共通見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對墮落後的蘇聯的見解而得來，托洛茨基對蘇聯有深刻精細的研究，他關於蘇聯革命的理論和路綫令我們完全信服。」但「托洛茨基關於蘇聯革命的理論和路綫」究竟是什麼？蘇達沒有任何交代或解釋，只是抽象地說：「我們又看出第三次革命後的中國，在本質上和史大林官僚集團篡位後的蘇聯相同」。但「相同」的「本質」是什麼呢？蘇達又不加以任何解釋，好像一切事物都是自明的，但他又宣稱：「作為黨的思想基礎，這是不夠堅強的，這還帶有很大的信仰成份，」所謂「作為黨的思想基礎」是什麼？蘇達又不給以解釋，要人們去猜測，這樣一來，他所謂「黨的思想基礎」，不但「帶有很大的信仰成份」，簡直是一團迷霧，或「空中樓閣」了。

爲要澄清蘇達所放出的迷霧和空想，我們便不得不多寫幾行來解釋一下了：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達到勝利的，這是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所以勝利之後即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隨後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財產制，但由於舊俄的落後性和西方先進國家工人階級革命的失敗而陷於孤立，而以史大林爲首的官僚（這也是落後性的產物），得以團結一切官僚份子於其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層，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機關，以特爾米多式的政變，摧毀了保持十月革命傳統的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把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爲官僚獨裁，以民族保守主義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代替了世界革命的方針，但史大林官僚層爲了保持官僚享受特權的物質基礎，不得不保留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有財產制，這就在下層的經濟基礎和上層的政治結構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要解除這種矛盾，只有經過政治革命才有可能——這就是托洛茨基「深刻精細」地研究「墮落後的蘇聯」的「理論和路綫」。

至於中國第三次革命後的演變和「蘇聯」的演變并不完全「相同」。首先，這個革命是在一個完全史大林主義化的中共領導下，單靠農民武裝取得勝利的，所以它建立的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它不但沒有及時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反而保護它，甚至拖延土地改革，企圖在幾十年內去完成那個反動透頂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綱。但「在國內外的階級矛盾的壓力之下」（如朝鮮戰爭，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攻等），中共爲了自保，才被迫地實行土地改革，用「公私合營」的手段完成了「國有財產制」，并逐步地排除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形成了中共一手把持的官僚獨裁，這就同蘇聯一樣，在下層經濟基礎和上層政治結構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便是中國托派運用托洛茨基研究「墮落後的蘇聯」的「理論」和方法以研究中國得出來的「路綫」，也就是根據「新中國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以及必然的趨勢所做的科學的分析」的總結，也許不夠「周密」，但它一般的正確性是不可否認的，因爲它已被二十餘年來事變的發展所證驗了。

但蘇達堅持說：「在這方面，我黨不但沒有達到見解一致，而且，這個研究工作根本還進行得很少，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套深

人而成熟的意見提出來。」我在上面已經指出：「這個研究」，已「進行」了二十多年，並得出了結論，在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已「達到見解一致」。在中國，除了蘇達及其追隨者外，絕大多數的同志不但同意，而且為它鬥爭了。如果蘇達不同意，又如果他是為「我黨」負責，不是專事批評，光說空話，那他就應當「做周密的科學分析」，提出「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見」來，給大家看看。如果真是「深入而成熟」，我們是準備着接受他的「意見」的。

(三) 蘇達最後強調說：「在這樣脆弱的思想基礎上，我黨根本沒有可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根本沒有可能通過有力的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更談不到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這段妙不可言的話，須要分開幾點來說明：

A. 說「我黨」的「思想基礎」是「這樣脆弱」，這是蘇達的主觀判斷，這裏不須再和他辯論，因為前面已說得夠清楚了。至於說「我黨根本不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這就完全抹煞了事實，「我黨」早已進行了「理論鬥爭」，也許不夠「強有力」，但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例如中國托派最初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張，已贏得第四國際旗幟下全體托洛茨基主義者，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同意，現已在世界範圍內為它進行宣傳。在中國大陸，因為沒有托派的組織，當然不能「通過宣傳工作」去「影響」那裏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但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先鋒隊和革命的知識份子，根據他們自己的親身經驗，已於去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門的示威中表示：「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惜拋頭洒血。」這不是未來「政治革命」的預告嗎？這不是「我黨的思想基礎」反映了客觀局勢發展的要求嗎？即以香港來說，雖然那裏的托派組織很小，但已「通過宣傳工作」「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了」。例如近年來，托派在「十月評論」上發表反擊毛派的造謠污蔑的許多文章，毛派都不敢，也不能回答。這就足夠證明，「我黨的思想基礎」的「強有力」了。同時，「通過宣傳工作」，托派的「聲音」已得到了左傾份子的「回響」。例如：我們反對「官僚獨裁」，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已在左派刊物，如黃河，左翼評論和學苑中反應出來了，難道這還不是事實嗎？不是證實「托派思想的堅強」嗎？我們深信，「托派的思想」將隨着時間的前進而進展的。

B. 把蘇達上面一段話反轉過來，如果有一個「堅強的思想

基礎」，「我黨」便可以「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乃至「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但他又忘記了一件小事，「我黨還是一個十分微小的組織，像這樣的小組織，即使有堅強的思想基礎，又怎能夠「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呢？這不等於說，只要有「思想基礎」，不管運用「思想」的工具——黨的能力和客觀條件如何，可以隨意製造奇跡，「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嗎？讓蘇達用他的「周密的科學」去解答這些問題吧！

C. 蘇達在另一方面肯定地說：「在國內政治革命爆發之前，在香港形成托派領導的強大的群眾運動……這種可能性是微小到幾乎等於零」（同上引文第三頁）。既然如此，那麼，托派又怎能專靠「思想基礎」，「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呢？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D. 一種「思想基礎」，即令是「最堅強的」，也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的，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黨，它的「思想基礎」總算得夠堅強的了，且擁有相當的群眾和先鋒隊，即以黨員說便有四萬人。但在七月以前，它在無產階級組成的先鋒隊蘇維埃中還是居於極少數，只有到八月哥尼洛夫的叛亂被壓平了之後，布爾什維克黨才於九月間，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蘇維埃中取得絕大多數（但不是「整個先鋒隊」，更不用說「整個階級」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由此舉行暴動，奪取了政權。蘇達對於這種偉大的革命經驗和寶貴教訓，完全沒有體驗到，只是把一些偉大的字眼和抽象的辭句拼湊起來，當做「批評的武器」，向黨大肆「批評」，大發議論，這表明他的「科學研究」，不但欠缺「周密的分析」，簡直是「不知所云」了。這除了在那些沒有馬克思主義修養和缺乏革命歷史知識的人們當中，引起混亂、迷惑、離心傾向和頹喪情緒外，再不能有其他的结果。

關於「黨的領導核心極不勝任」的問題

蘇達從「理論」上、「思想」上和「政治」上，批評了中國托派「欠缺堅固的理論基礎」，或是「脆弱的思想基礎」後，便進而從組織上批評黨的「領導核心」的「極不勝任」或「幼稚無

能」，他說：

「在第三次革命勝利前，我黨可說曾具有一個這樣的（領導）核心，那就是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為代表的領導集團，……

，可是，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暴露了我黨有重大錯誤，連帶地也暴露出原有的領導核心實在并不勝任。此後二十幾年來，犀照同志和中委會原有的其他同志一直都沒有做到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一個堅固的理論和政治基礎，因此，同志們很自然地普遍對他們喪失了信任，而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同志越不再信任他們。

「至於一九五二年成立起來作為原中委會的繼承者的全臨會……更一貫地表現出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信任，這情況在最近四年裏并無好轉，只有暴露得更明顯。他們掛着領導機關的名義，却完全起不了真正的領導作用。目前我黨顯然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核心」（同上第二至第三頁）。

蘇達上面對「領導核心」的「不勝任」和「極不勝任」的指責，含有極深刻的用意，和他以前所散佈的「名存實亡」說（見他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寫的「怎樣着手去重建校友會」第一頁），聯系起來，可能在某些人中發生惡劣的影響，必須分成幾點來給以詳細檢討：

（一）說「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為代表的領導集團」，「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暴露了我黨有重大錯誤，連帶也暴露出原有的領導實在并不勝任」，首先要問：「重大錯誤」在那裏？是不是「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或「幼稚無能」，有如蘇達以前所批評過的呢？如果是，我在前面，根據文件和事實，已經解答過了。如果不是，那只有等到蘇達指出新的錯誤的證據來，我們再來解答。

（二）說「二十幾年來，犀照……沒有做到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一個堅固的理論和政治基礎」。我們又要問：怎樣「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堅固的理論政治基礎」呢？是不是指分析我黨失敗和中共勝利的諸原因，由此做出總結，得出教訓，「為黨建立理論政治基礎」，提出鬥爭的政治路向呢？如果是，我們在一系列的文件，如「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等中已經解釋過、闡述過和論證過了，而且在本文的前部份又重複了一次。如果蘇達

認為所有這些還不夠，甚至錯誤，就請他提出另一套解釋、論證和「理論政治基礎」，以及「鬥爭的路向」來，我們是準備接受他的挑戰，從長討論的。

(三) 說「同志們很自然地普遍對他們喪失了信任」，請問蘇達，他這種判斷根據什麼文件或調查記錄？如果拿不出文件和調查記錄來證明「同志們很自然地對他們喪失了信任」，那就表明：如不是有意中傷，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志」了！

(四) 至於說「越是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越不再信任他們」，這裏所謂「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指的是誰？他沒有說出姓名來，我們不便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蘇達自以為是「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但他的「獨立思想能力」創造出來的作品是些什麼貨色？是不是「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和「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呢？如果是（實際上一定是，因為除此以外，再看不到他有什麼偉大的作品。），那我們已經批評過了前者，并正在批評後者。它們所包含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些什麼東西，讓同志們（包括「不信任的同志」）去鑑賞蘇達的「獨立思想能力」所創造出來的傑作吧。

此外，根據蘇達的親密朋友關係看來，陳勝最可能是他所謂的「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之一。就陳在組織內部鬥爭中所採取的態度、方法和言論看來，差不多和蘇達所採取的異曲同工。可是這位「有獨立思想能力」的陳勝，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的「戰訊」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反右傾的鬥爭」。在該文中分析了「毛江派」所發動的「反右傾翻案風」為「進步的」之後，聲明「支持反右傾翻案風，不等於支持毛江派，毛江派既然裝成『左』，在策略上，應該視他們為暫時的同盟者，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右傾的官僚」。不幸得很，四月五日天安門的示威者（十萬人），恰好和陳勝「唱反調」，高喊「打倒慈禧太后（江青）」的口號，「讓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毛澤東們）見鬼去吧！」這不是打了陳勝一個大巴掌，對「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的大諷刺嗎？我們不知道蘇達對此作何感想？！

還有一件事值得指出的，就是：「革馬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出版的「戰訊」上，發表了一篇綱領性的文章——「中共官僚統治的危機與政治革命的前途」，該文說：「毛派主要的社會基礎，向來都放在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政治覺悟最高底階層的身上，……至於右派（即周鄧派），則其社會基礎建築在正在凝聚中的科技管理人員、知識份子、國家機器的官僚幹部和比較富裕的

農民這樣的階層上面」，並說前者執行了「不斷革命」，後者則是反對它的。這樣露骨的親毛傾向，連一向支持革馬盟的耕野也感到難於緘默，起而批評說：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非但應該像我在上面所說的去『擁毛反右』，而且已沒有理由堅持對毛派採取政治革命的路綫」（見耕野致革馬盟胡、陳、明的信，刊載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版的「戰訊」）。

耕野對革馬盟親毛傾向的批評，可說是「一針見血」。從這點說，他還保持着托洛茨基主義的一些原則，是值得贊許的。蘇達和耕野一樣，同是革馬盟的支持者，而且該組織的領袖陳和明，又是他的親密朋友，但他對革馬盟的親毛傾向，是否和耕野一樣，採取了公開的批評呢？沒有，這表明，「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蘇達，只是對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採取「獨立」批評的態度，而對於革馬盟的親毛傾向，假如不是事先同意，至少是事後包容了。

（五）說「一九五二年成立起來作為中委會繼承者的全臨會，……更一貫地表現出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這種情況，在最近四年裏並無好轉，只有暴露得更明顯。」為要「暴露」這段話的作者對托派所遭受的極嚴重的打擊及其最艱險的處境之完全無知，或故意抹煞，我們必須把它分成三部份來討論：

A. 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即以全力進行搜捕托派份子，到一九五三年初，留在大陸所有的托派及其同情者，甚至他們的家屬都被捕、監禁了。這就給了中國托派一個致命的打擊，把托派在二十年中所建立起來的基礎掃蕩無遺，這對中國托派運動是一種劃時代的災禍。和三十年代的蘇聯，在史大林策劃下的大審判案剷除托派（當然還有老布爾什維克右派）的情況是相類似的，只是規模的大小不同而已。

約在一九四九年左右，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領導份子和幹部，盡力在當地重建領導機關，出版機關報，訓練幹部，整理組織，準備向外發展，但工作剛剛開始時，却遭到港英當局的壓迫。大批同志被捕、被驅逐，最後是領導份子被迫流亡。於是，香港的托派第一次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跟着的，是國際領導的錯誤政策又給香港托派帶來了災禍。由於以巴布洛為首的國際領導層，認定第三次中國革命實行了不斷革命論，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托派沒有獨立發展的歷史前途，只有參入中共幫助它去

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主張香港的托派份子回到大陸去參加革命活動，因而發生了「回鄉運動」，如阿蘇、阿余、阿毛等一批人所實行的。這些返回大陸的同志們的命運如何，極少消息，多半是悲劇性的，但對於香港的組織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了。從此以後，香港的托派愈來愈陷於孤立，再加上內部不斷的爭吵和派系鬥爭（這也是在革命中失敗後陷於孤立的革命組織不可免地發生的現象）。這種內部鬥爭經過一段時期後，由於鬥爭沒有積極的結果，雙方的領導份子及其追隨者，不是脫離運動，便是消沉下去了。在這樣外來的強大打擊和內部不斷紛爭的情況下，怎能產生「勝任的領導」，得到同志的信任呢？

一個在革命運動中失敗而又陷於極端孤立的組織，不但不能成立「勝任的領導」，「得到同志的信任」，而且往往是相反的。例如，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德國共產黨員不是消極或脫離，便是流亡到國外去了，尤其流亡到英國的最多。那時雖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傑出的領袖，不但建立不起「勝任」和得到同志「信任」的領導，反而陷於最糾紛的漩渦中，因為流亡者中意見紛歧，互相爭吵，形成了兩個不可調和的派系。最後，使倫敦的中央委員會分裂成兩部份互相攻擊，經過「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之後，共產主義者同盟也就瓦解了。這表明：雖然有「堅固思想」和偉大天才的領袖，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是不能轉變不利的客觀局勢，製造奇跡，如蘇達所想像的。

留在香港的托派，雖然困難重重，但剩下來的幾個領導幹部繼續補充的「全臨會」還是勉強地維持了殘局。斷斷續續地出版刊物（如响導）和小冊子（如「對擁護人民公社的各種意見的批評」和「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等）及「校內公報」等。雖然不能維持組織的正常生活，但還能時常集會，交換意見，討論國內外的時局，更重要的是，對大陸發生的重大事變，如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革命等，都發表了對它們的分析、評斷和預測，不管這些工作做得不夠好，或有缺點，但總算表示出「全臨會」的繼續存在，繼續活動，在二十餘年最艱苦的長時期中，把中國托派的政治和組織生命維繫下來了。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不是蘇達的唯心論）的觀點來檢討「全臨會」的負責幹部的工作，是應該給他們一個公道的評價的，那就是：他們在中國托派運動最艱苦的長時期中，起了「繼往開來」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的艱苦奮鬥和逆流游泳的精神，中國托派運動也許早已「瓦解」或中斷了。

如果我們將歐美各國托派運動的情形拿來和中國托派運動加以對照，就顯得後者的突出。在西歐（除納粹佔領時期外）和美國的托派享有公開出版、集會和競選選舉的自由，在領導機關服務的是「職業革命家」（即生活費由黨維持）。雖然如此，但能長期奮鬥的還是少得很，例如法國托派（法國托派在西歐算是最好者之一），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加入運動的黨員剩下來的不過兩三打人（這現時四個托派組織的老黨員），而積極負責活動的更是寥寥無幾。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正常發展」的典範，但三十年代加入它的老黨員也只剩下不過一打多人，一貫積極活動的更少，即以四十年代加入的黨員來說，剩下來的不過兩三打人，而至今積極負責的，也不比三十年代加入的老黨員更多些，假如不是更少些的話。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即令在條件最好，享有相當民主自由的國家裏，托派運動還是極難發展，因為參加運動的成員和幹部不能堅持長久奮鬥，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一方面托派總是遭受史大林派的不斷造謠污蔑，甚至謀殺（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等）和法西斯的迫害（如希特勒佔領西歐大陸的時期），以及資產階級政府的打擊（如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社工黨的大批領袖被捕監禁以及戰後麥高湯法案的迫害）。另一方面，從一九二八年末在各國成立托派組織算起，到現在已近半個世紀，即以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第四國際來算，亦快四十年了，在如此悠長的歲月中是很難堅持繼續奮鬥的。革命家也是人，忍受艱苦總是有限度的。只有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及其歷史使命有深刻理解而又具有最堅強意志的戰士們，才能抵抗一切艱苦和打擊，百折不撓長期奮鬥，死而後已。但這樣的奮鬥不能求之於一般的革命家，所以三十和四十年代加入托派運動的黨員，由於忍受不住長期艱苦奮鬥，成千地退出鬥爭舞台了。中國托派在長劫中遭受了極有的挫折和艱苦奮鬥之後，還剩下少數老幹部（他們都是四十年代左右加入運動的）繼續進行鬥爭，對他們來說，是可以引為自豪，值得尊敬，和青年效法的；只有別有用心之徒，才會貶低他們，指責他們，惡意中傷他們。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的：革命家的嚴重考驗之一，要看他是否能夠抵抗嚴刑逼供。現時的領導幹部中，有一位老同志，曾經二次被捕監禁，尤其在一九四三年被日本特務拘捕時，經過了殘酷的拷打，他始終忍受得住，沒有供出一個同志的姓名、住址和任何秘密，以致連拷打者也承認他是「好漢」。在這方面，蘇達并

無光彩，因為他一經被捕，即吐露了我們護照上的姓名，以致我們無法回港替運動服務。

B. 蘇達指責「全臨會」「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但他自己在那個二十多年的長時期作了什麼呢？如果他有責任感，為「我黨」負責，為什麼不及早提出批評和建議，以改造那個他認為「極不勝任的全臨會」呢？即令「全臨會」不同意他的建議，他還有權利（一個黨員的權利）向同志們，尤其向那些「不信任」「全臨會」的「同志」們呼吁，提出具體的辦法，請求大家討論，作出決議，以改組「全臨會」，或另建新的領導機關。他為什麼不這樣做？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正當全臨會自己振作起來，開始整頓組織，恢復正常生活，準備出版公開刊物時，他才大寫文章，宣言：「中國T學校校友會（即中國托派組織）早已名存實亡了」（見蘇達一九七三年九月寫的「怎樣重建校友會」第一頁），這就根本否認了「全臨會」在二十多年中繼續存在的事實。因此，他主張「重建校友會」，提議「成立一新的統一的中T校友會（即中國托派新的組織），代替舊的組織。新會恢復使用一九四二年分裂前的組織名稱，或另定新名稱，新會仍然為四際中支」，這就等於說，取消中國革命共產黨的名義，以便和那個在一九四二年違反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小派別殘留下來的兩個人成立中國托派的新中央委員會，恢復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或另用新的名稱，這便是蘇達以「仲裁者」自居，對雙方「仲裁」所做出來的「總結」。想不到，在我們運動中竟有這樣狂妄的人！

在我們方面，除了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變，發表文章和訪問記，在國際上表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看法外，我們會密切地注視香港組織，在重重壓力之下所形成的孤立狀態、內部糾紛和種種困難，不斷地給以忠告、批評和建議，試圖調解爭執，協助克服困難，使運動繼續向前發展。

當一九六八年旅行日本時，我們從浪同志得悉香港組織的具體情況，知道那裏的組織趨於渙散，停止了正常的組織生活。因此我們回到歐洲後，即寫信給全體同志，指出世界局勢的新發展（如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間法國的革命和捷克的民主改革運動）有利於托派運動的擴張，以鼓勵他們振作起來，復興事業，并建議籌集資金，出版公開雜誌，以期廣泛地傳播我們的思想和主張。全臨會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於短期內籌集了可觀的現款，足以應付刊物的出版，但問題在於缺乏一個負責主編的人，我們會推

蘇達擔任這個職務，可是，被他拒絕了。這表明，蘇達除了肆意批評和大發議論外，是絕不願意擔負組織的任何重要實際工作的。

從一九七二年春天起，香港70年代集團中的一批青年陸續地到法國留學，並訪問我們。因此，我們有機會和他們討論有關革命的思想問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此種討論經過了半年之久，最後說服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從無政府主義思想轉變到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來了，這便是從一九七三年秋起，一批青年托派出現於香港政治活動的來源。這表明，我們不只是專做建議，只要一有機會，我們是盡力之所及幫助香港托派組織的發展的。

C. 蘇達說「這情況最近四年來並無好轉，只暴露得更明顯」。這就是說，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這段時期，「全臨會的極不信任」，「暴露得更明顯」。這種說法，不僅完全抹煞事實，簡直是惡意中傷，存心誹謗！

先看事實吧：一九七三年組織開始恢復了正常生活，由法國回來的青年托派，向外公開活動，一九七四年初開始出版「十月評論」，到一九七五年末，這個刊物已幾乎做到按月出版，差不多同時，青年團也領導出版了刊物「左岸」（後改為「新思潮」），……這一切，都是在「全臨會」的領導或幫助之下進行的。怎麼能說「全臨會的極不勝任，暴露得更明顯」呢？這還不是完全抹煞事實，惡意中傷，存心誹謗嗎？

另一方面，現時全臨會的負責同志，不像歐美托派領導幹部，由組織維持生活，他們是全靠自己從事職業以維持其家庭生活的，只利用業餘時間來替組織工作，如替刊物寫稿，開會討論問題，以及處理其他的一切事務等。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異常忙碌而繁重的。此外，他們還要設法替組織籌措必需的費用，如出版刊物和書籍等。像這樣艱苦工作和自我犧牲精神，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理應「得到同志的信任」和欽佩，予以積極的支持的。但蘇達却指責他們「極不勝任」，這還不是惡意中傷，或別有用心嗎？

蘇達對大陸和香港局勢的看法和建議

蘇達在他的「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中，化了大半篇幅描述大陸和香港局勢的演變，但他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

事變的發展，得出明確的結論，作為鬥爭的指南。相反，他用印象主義的描敘和學究式的講解，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和矛盾，致使讀者陷入迷途，為要讓讀者從迷途中轉向革命的道路，必須澄清混亂，解除矛盾。

先讓我們看看蘇達關於大陸局勢演變的論述吧：

「中共統治，自從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上層危機中打滾，由於官僚特權層的本性所決定，中共面對着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問題時，不是採取比較民主，比較多依靠群眾的路綫，而是反過來越來越遠離群眾，加深寡頭統治和個人獨裁的程度，但結果並未達到維持黨內團結和穩定的目標，反而使上層危機接連爆發而且日益劇烈。」

（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五頁）

蘇達寫了上面一段印象主義的描敘後，即對大陸局勢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總結：

「由於十年來中國人民已經飽受毛澤東六搞假革命之苦，飽受在繼續『革命』名義下給予他們的種種打擊。所以他們那種普遍對現狀不滿的心理，與其稱為『人心思變』倒不如說是『人心思安』。……但『思安』則是感覺紛亂、震動、犧牲已經太多了，更多的變亂和犧牲是無意義、無價值的，希望那些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人放下屠刀，讓人民過安定的生活。現在中國人民的普遍心理屬於後一種。……這不是革命臨近的徵兆，而是革命前途尚遠的徵兆，現在繼續『革命』的口號，在中國的名聲並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當作災禍。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新領導集團提出大治的前途是爭取人心的聰明手段」（同上第五頁）

蘇達從他的「人心思安」的哲學得出的總結：「現在繼續革命的口號在中國的名聲並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當作災禍」，這樣，就根本否認了作為推翻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的中心口號——「政治革命」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而且表現出蘇達的自相矛盾，因為他也是贊成（在口頭上）政治革命的。

我們要問蘇達的是：所謂「普通人民」代表什麼階級呢？他們的「思安心理」又反映了什麼階級的意識？或者是反映了超階級的意識？如果就愛好「過安定生活」，把「繼續革命當作災禍」來說，當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願望，但這和近年來大陸的工人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提出的要求和表現的行動是不相符合的，我們只須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就夠說明人民的意向和行動了。

蘇達聰不會否認天安門廣場十萬示威群眾，是反映了大陸人民的「普遍心理」吧。他們的「心理」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激烈的言語和暴力的行動中。他們摧毀警察車輛，焚燒軍用房屋，這還不是革命的行動嗎？他們宣稱：「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這不是指毛澤東的統治已經過時了嗎？他們宣言：「我們相信馬列主義，讓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這裏所謂「秀才們」指的是誰？不是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嗎？他們宣誓：「爲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惜拋頭洒血。」這是爲了「過安定生活」嗎？而且在這個宣誓幾點鐘之後，他們當中幾百人，在毛澤東的血腥鎮壓下，果然「拋頭洒血」了！像這樣震動全世界的巨大事變，蘇達對它作了什麼評價呢？什麼也沒有。他只是把「天安門事件和李一雷大字報」平行起來，指責他們「還未拋棄對整個官僚層的期待，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同上第六頁)。這種指責，簡直是迂夫子的口吻。他完全不懂，當革命群眾在沒有革命黨的領導下，常是對統治層中的溫和派或改良派懷抱幻想，如一九五六年中匈牙利的革命群眾對納吉派之抱幻想，就是最新鮮的例子。天安門的群眾，事先毫無組織和行動計劃，只是在偶發事件（搬走獻給周恩來的花圈）的刺激下，自發地行動起來的。怎麼能責他們「還未拋棄對整個官僚層的期待，提出奪取政權的口號」呢？假如這不是對革命群眾的行動滿懷成見，便是對事變的發展幼稚無知。

在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看來，天安門事件，是表示人民大眾對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統治之第一次挑戰。因爲人民在這個統治的二十八年中，既失去了一切的社會主義民主權利，而生活又日趨貧困（工資已凍結了十年，物價却不斷增漲），再加上毛澤東爲了鞏固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不斷地發動「運動」或鬥爭，以清除他的一切反對派系，致使人民大眾、中共自己的基層黨員和幹部都經常陷於恐懼狀態之中。這一切含有爆炸性的因素，積累起來便成了天安門事件爆發的根源。這是匈牙利革命的回響，中國政治革命的序幕。

這種政治革命，我們早在二十年前，根據中國事變的發展已預測過了，並且給它提供了政綱。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第一次用語言和行動證驗了政治革命的必須和正確性。我們一定要把天安門事件看做政治革命的起點，向革命的群眾指出：他們必須從天安門事件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要的是他們必須組織自己的革命共產黨，當時機到來時，舉行起義，推翻官僚獨裁，奪取政

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讓蘇達假借「那些飽受假革命之苦的群眾」詛咒「我們唯恐天下不亂，企圖混水摸魚」吧（上引文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七頁）。中國大陸的革命群眾一定會依照托洛茨基主義者所指出的，天安門的示威者所開始走的道路——政治革命——前進的。

蘇達對香港局勢演變的論述，比起他對大陸所做的，較少混亂和矛盾。其中有些甚至是值得參考的，如對港英當局施行「開明政策」的解釋，毛派思想在香港激進青年中的影響及其（激進性和保守性）的分析。但他沒有一句話提到天安門事件對於香港的影響，正如他對天安門事件的重大意義沒有給以任何評價一樣，這表明他只看到樹枝而不見森林。

事實上，天安門事變給了香港的激進青年和一般輿論界的一個極大的刺激，使人們對大陸的看法發生了轉變，在此以前，香港的毛派，通過學聯的領導，差不多控制了激進化的，至少大部份的學生青年。在天安門事件後，學聯發生分化了，部份院校的領導已落於反毛派之手。「學苑」從親毛派轉到反毛派，就是顯著的事實。香港的輿論界，多年來，毛派的報刊都處於進攻的陣地，但在天安門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清算四人幫事件，毛派刊物（文匯報、七十年代等）都陷於狼狽不堪的狀態，而處於退守和自衛的地位了。

另一方面，代表激進思想的刊物和集團，在天安門事件以前，是孤立的，受毛派排斥的，但在天安門事件後，這些激進青年團體昂起頭來向毛派進攻了，如「黃河」雜誌派之向新華社投遞抗議書，各左派團體在維園集會抗議毛澤東對天安門示威者的血腥鎮壓，要求釋放被捕者。同時，非毛派的刊物，如南北極、明報月刊、乃至明報，都對天安門的示威及其犧牲者表示同情和憤慨，因而把同情擴展到與天安門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周鄧派，以致毛澤東的聲譽在香港一落千丈，甚至成為攻擊的主要目標。對托派來說，天安門事件不但證驗它所一貫主張的政治革命的正確性，而且它所提倡的推翻 官僚獨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已得到了廣大的回聲，本年七月各左派團體（代表十月評論、左翼評論、戰訊、黃河及部份大專學生等）的聯合集會，公開討論中國的現狀和前途問題，達成了較接近的意見。這對於香港托派運動的未來發展準備了新的條件。

從上面所敘述的事實總結起來：香港和大陸一樣，天安門事件給它們劃了一個標界，從今以後，毛澤東的思想和影响已「日

落西山」，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影響將「如日東升」。

至於蘇達對香港運動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議，其中有些可供參考。但它們缺乏一個理論和政治的中心，乃是經驗主義地把各種各式的問題平列起來，再加上錯誤或歪曲的解釋，便顯得混亂和矛盾了。因為，一方面，他完全不懂得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理論和政治的傳統，如前面詳細地所指出過的，另一方面，他自己沒有堅實的理論和政治基礎，這從他任意攻擊黨的理論基礎和政治立場所暴露出來的。因為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批判蘇達的一切錯誤、混亂和矛盾，而且本文的主要任務，在於分析和批評蘇達在理論上、政治上和對黨的傳統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現在讓我們把這一任務進行到底吧。

對蘇達「簡評綱領草案」的分析

在「簡評綱領草案」時，蘇達確是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於人們面前。因此，對他的「簡評」值得詳加分析。這裏指出三點，分述如下：

(一) 蘇達在「簡評」一開始即指出：「綱領草案第十二條批評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初期保存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說這政策『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立即無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其實，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這樣的主張，草案這句話是信口開河。」因此，他大顯其歷史博學知識，引證共產黨宣言的綱領文句，十月革命後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的經過，以及一九三二年托洛茨基教導德國無產階級怎樣辦的意見等等，以證明「草案」的「信口開河」。

我們承認，綱領草案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立即無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這句話中的「立即」兩字是有語病的，或過激的。但并非「信口開河」。蘇達拿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所規定的政策來替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的機會主義政策辯護，這是對歷史開玩笑！他完全忘記了，或不懂得，共產黨宣言發表時正是資本主義開始向上發展的時代，中共取得政權時，資本主義早已發展到它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時代了。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和中共取得政權之間已有一百年以上，拿前者的政策來辯護後者的政策，這還不是對歷史開玩笑嗎？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取得政權後，并不是依照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行事（即把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放在不定的時期去解決），而是在短期內，即取得政權八個月後（一九一八年六月），基本上已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托洛茨基在

一九三二年教導德國無產階級怎樣辦的話中，如蘇達所引證的，「工廠可以借紅衛兵的幫助而奪取」，他在一九二八年談到，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和第三次革命的前途時，就已經預示，第三次革命開始將會觸犯資產階級的財產制。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的革命發生後不到三個月，工人群眾便自發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大量財產，如銀行、保險公司、運輸企業和工場等。蘇達能指責葡萄牙工人群眾違反了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嗎？

歷史發展到了我們的時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不但絕不能依照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去進行，就是十月革命的經驗也不能死板地去抄襲。這就是說，越是接近資本主義的死亡時期，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對資產階級的剝奪也就越激烈。這是依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歷史發展的分析所得出來的結論。讓蘇達向歷史的發展規律去嘲笑吧。

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公開宣佈「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博學的蘇達為什麼不從共產黨宣言、十月革命後的經驗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等的文獻中搜尋論據，替中共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辯護，反而默不作聲呢？！

另一方面，蘇達却大肆宣揚中共的「成就」，如說「中共在內戰勝利後迅速地穩定了金融物價，並恢復了生產，這是偉大的成就，中國內外（包括第四國際）引起了普遍的贊揚。」這種「贊揚」不知根據何種文件或報刊。就我們所記憶到的，並不會看到「普遍的贊揚」。如有的話，讓蘇達去找出論據來證明吧。還有，史大林佔領了東歐各國後，也「穩定了金融物價，並恢復了生產」，為什麼蘇達完全緘默呢？這是否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贊揚中共呢？否則，就是對中共懷有特別的好感了。

（二）蘇達引證綱領草案二十條最後一段話：「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仍然是最有效而必須遵守的原則」，他認為「這見解包含了幾重的錯誤」，因為「在僅僅能夠『按勞分配』的時代，根本不可能實現『各盡所能』，而到了真正能夠『各盡所能』的時候，必然也能夠『按需分配』了」。蘇達對「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一解釋，確是根據托洛次基一九三六年批評斯大林的新憲法的意見中演繹出來的（見「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章第一節）。這是蘇達的全文中含有積極意義的一點貢獻。但他說：「在現階段的中國，不但不能實現『各盡所能』，連『按勞分配』的條件都不夠」。這種說法

不但正確，而且是大錯特錯的。試問，「果說『現階段的中國』，『按勞分配的條件都不夠』，那又怎樣進行『分配』呢？蘇達對此毫無交代，因為他提不出任何別的分配方法來代替『按勞分配』。事實上，『按勞分配』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迫不得已的辦法，無所謂條件夠不夠的問題，在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一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都必須採取『按勞分配』的辦法，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解決『分配』問題的。而且國家愈是落後或貧窮，如『現階段的中國』，就愈加需要『按勞分配』。問題在於執行『按勞分配』的政權，是否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官僚專政。如果是前者，在它開始執行『按勞分配』時，務必使『按勞分配』所發生的工資差距限制到最小程度，並用法規使這種差距漸趨縮小，漸臻平等；同時盡力提高教育水平，務使社會所有成員的智能平均發展，逐漸消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發展生產力，增加生活物資，不斷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大力促進世界革命的完成中，結束『過渡時期』，逐步走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道路。如果是官僚專政，像現時的蘇聯和中國的情形，所謂『按勞分配』，不過是特權官僚擴大其層份（如以高薪吸收擁護者）和維持其特權的物質享受作掩護而已。

三、蘇達引證綱領草案第三十三條「指出一枝農民軍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始終就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枝軍隊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蘇達嚴厲地批評了這種說法的錯誤。但這種說法，和蘇達所說的「正因為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中共身上」，是類似的錯誤，因為它們同樣忘記了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條件，如我在前面所指出過的。「如果沒有那些錯綜複雜條件的配合，中共單純依靠農民武裝隊伍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換句話說，綱領草案的錯誤和蘇達的一樣，只從主觀方面看問題，而忘記了客觀條件所起的決定作用。

四、關於「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黨？」蘇達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大篇議論，並引述了中外托派份子對它的各種各式的看法，但他自己卻沒有說出中共的性質是什麼。最後，他根據「上引草案那段話對於一個問題彷彿是確定了立場」，就是「自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一直是史大林主義的黨」，他這種「彷彿」「確定」的說法倒是真的，因為我們在過去幾十年所寫的許多文

件中，
是蘇達
什麼？
命的，
聯官僚
是：他
問題一
階級，
怕從正
滑的爭
不過，
我們來
，一定
托
等為史
的含義
次，現
階級意
稱歐洲
是同樣
的工人
這些黨
它們和
改良，
專政，
替資本
蘇
國建設
命政策
總路線
聯集團
政策的
政策了
現
性質的
，我們

件中，都說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黨，或史大林主義的中共。可是蘇達跟着「追問」：「所謂史大林主義黨，在政治上的含義是什麼？說得更具體些，這是否表示某一階級性？是否表示它是革命的，或機會主義的，或中派主義的？又是否表示它完全遵照蘇聯官僚的路綫？」從蘇達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中可確定一點，就是：他反對確定「中共為史大林主義黨」的。可是他又和對其他問題一樣，不說出他自己對中共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或代表什麼階級，只是「追問」人家，盡力避免表示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害怕從正面表示自己的意見後，會受到別人的批評，這是一種最狡猾的爭論方法，對自己，當然「佔便宜」，可是太不負責任了。不過，我們還得「追問」他：他對中共的性質究竟怎樣看法？對我們來說，認定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是含有一定的內容，一定的階級性的。

托洛茨基和所有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稱蘇共、法共、意共等為史大林主義黨，並且寫進過渡綱領中，至於它們「在政治上的含義是什麼？」「這是否代表某一階級性？」我們曾說過無數次，現在再說一遍：史大林主義黨，「在政治上」是代表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黨，等於列寧、托洛茨基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稱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包括俄國的孟什維克）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是同樣的。不管這些史大林主義黨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擁有廣大的工人黨員，就其組成份子說，是些工人黨，但在政治上，即就這些黨的領導所執行的基本政治路綫說，是小資產階級的，因為它們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所追求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謀取民主改良，而不是準備無產階級去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專政，以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而它們的政策，在實質上是替資本主義（包括帝國主義）的統治服務的。

蘇聯的史大林黨（蘇共），爲了特權官僚層的利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放棄了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政策，因而實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總路綫。在國內實行官僚專政，任意剝削和壓迫工農大眾。在蘇聯集團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除了變成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工具外，已和社會民主黨同流合污地實行同樣的改良主義政策了。

現在的問題是：蘇達是否同意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蘇共性質的看法？如果不同意，他就應該公開說出來，如果同意的話，我們便要進一步問：中共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

我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以及「實行官僚專政」，「任意剝削工農大眾」等政策，是否和蘇共相同呢？在這些有關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上，是絕不能容許含糊或避免作答的，讓蘇達認真考慮後來答覆這些問題吧。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

蘇達在「怎樣建立校友會」一文中，斷言「中國T校校友會早已名存實亡了」以外，並指責「二十年以上的老幹部也大都非常缺乏政治的歷煉，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已漸趨衰老，能力上仍舊非常幼稚——總而言之，我們的傳統是很微弱的，今後想打開前途，必須從頭做起。」關於蘇達辱罵「老幹部……能力上仍舊非常幼稚」的話，我不想浪費筆墨來批評它，因為這已越過批評同志的限度太遠了，讓讀者去思索這句話的含意，并把這句極端侮辱的話當作一面鏡子去照照侮辱者的嘴臉吧。我所關心的是「我們的傳統很微弱」，如果真如蘇達所判定的，經過了將近半世紀最艱苦的鬥爭，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中國托派，除了錯誤、罪惡、領導者的「幼稚無能」、和「老幹部……能力上非常幼稚」外，沒有留下任何值得重視的經驗和教訓，所留下來的只是沾滿污點的廢紙而已，歷史的事實果真如此嗎？首先應該問：什麼是「傳統」？就一個革命黨的傳統來說，主要是它的理論、政治、組織原則及其幹部的奮鬥和犧牲精神，在鬥爭過程中，經過事變的考驗得出來的經驗和教訓的總和。我們就根據上述的傳統的要點，檢查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吧！

首先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由中共一部份領袖和幹部，根據他們領導和參加第二次革命所得到的親身經驗和失敗教訓，在托洛茨基的思想啓示下，組織起來的，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只有美國托派運動可以比擬，因為後者也是一部份領導幹部（如加農）所組織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開始就嚴肅地研究了第二次革命的全部經驗和失敗教訓，以及導致這次革命失敗的最高領導——共產國際強加於中共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策。這種研究寫成爲中國左派反對派的綱領，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由陳獨秀、彭述之、尹寬、陳碧蘭和鄭超麟等八十一人簽名發表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這篇文件有系統地論叙了史大林強加於中共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政策，並追溯此種政策的根源——史大林在列寧逝世後

篡奪了黨和國家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權，以階級合作代替了階級鬥爭，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代替了國際革命的方針，以官僚集中制代替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因而破壞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創立起來的共產國際及其各國支部；最後，文件提出了最後的建議：「重新審查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改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因為當時托派

還在黨內鬥爭，故提出改組蘇共、共產國際及其支部的領導）。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所發表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是最有系統地第一次總結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政治和中國第二次革命教訓的一個文件，同時也就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對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大事變，我們都是根據這個文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它們，進行宣傳和鼓動的。這裏僅舉幾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變來表達中國托派的「傳統」。

一、一九三七年爆發的中日戰爭，是決定中國民族命運的一個關鍵性的事變。中國托派所採取的立場是：在軍事上支持蔣介石領導的抗戰，而在政治上批評他的反動政策，並在組織內部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鄭超麟、王凡西所代表的極左教派主義，進行了極嚴重的鬥爭，中國托派這個立場不但和托洛茨基的一致，並且為往後事變的發展證明其正確性。

二、當一九四七至四九年，中共被迫對蔣介石進行反攻，企圖奪取政權時，中國托派由於過份堅持原則，對中共採取了教派的態度，因而在政治上採取了錯誤的立場。這是應該從這種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後來我們檢討這種錯誤，得出了教訓。（彭述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從錯誤中得出教訓，也是屬於「傳統」之一。

三、一九四九年，中共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全部歷史上劃時代的事變。我們給了這個事變以極嚴肅的研究，分析它的勝利的各種原因，指出了它是一個畸形的革命，及其對往後發展所隱伏的危機，提出中國托派對它的態度和政策，最後指出新中國的前途多分是向東歐各國的道路走去，將成為變態的工人國家（同上）。一九五四年我們又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已踏上東歐國家的道路，成了「變態的工人國家」，因而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當一九六〇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兩個領袖和其領導

爭論中國問題時，我們參加了這次論戰，寫了「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對中共及其政權，作了詳細的分析，確定了「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專政」，必須由群眾的「政治革命」來推翻它，並為政治革命提供了一個大綱。由此，替中國托派對中國的戰略路線奠定了一個理論基礎。

四、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運動曾震動了全世界，直接地影響了五億農民的生活，我們根據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對農業集體化所定下的原則，以及蘇聯在二十年代末和戰後東歐各國實施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指出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運動是一種極端冒險主義的政策，勢必引起農業減產，增加農民的痛苦和引起全國人民的反感，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此種預測。

五、毛澤東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洲際報」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訪問記，曾經指出：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在於摧毀劉少奇派，由於毛在人民公社運動中遭到了失敗，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受到了打擊，在黨內和人民中的威信大為低落，不得不「退居第二綫」，讓劉少奇當權。由於劉少奇對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災禍，施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黨內外提高了他的信譽，這就威脅到毛澤東的地位，所以他組織「紅衛兵」，利用黨外群眾來摧毀劉派，以恢復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事變的發展證明了我們的分析一般地是正確的。

70年代初，毛派所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反右翻案風」、天安門事件、以及毛死後的「整肅四人幫」事件，對這一切事變，中國托派都給它們作了分析、批評和預測，經得起事變本身發展的考驗。

上面所列舉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中國發生的大事變所做的分析和判斷，都是根據托洛茨基主義的方法和理論，並經過事變本身的考驗，因而也就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

此外，值得指出的：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代表，二十餘年來直接參加了國際的活動，在國際內部的三次嚴重爭論和對四個國家的革命運動都表示了中国托派的立場，如反巴布洛的史大林主義傾向（「對巴布洛主義的批判」），反希利的極左教派主義（見「希利帶着社會主義勞工同盟往何處去？」）以及關於拉丁美洲游擊戰的冒險主義政策的爭論（見「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上來」）所有這些爭論的結果都證明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立場是站在正確的一方面。

當古巴一九五九年爆發革命時，中國托派的代表即對這個

革命做
并提出
巴革命
阿爾及
了批判
派的錯
(見「
一九七
中國托
年十一
月為葡
家的革
證驗了
派在意
我們保
代表國
意我們
「中國
關
黨內堅
的中共
基主義
的少數
的小資
了民主
黨」。
主集
共產
原則
於「
)，
經驗
方案
種事
被捕
示梅
在一
他們

革命做出了分析，預測了它的發展趨向（不斷革命的趨向），並提出了推動這個革命走向正常發展的戰略路線（見「關於古巴革命的決議草案」——為國際委員會起草的）。當一九六三年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進入高潮時，中國托派的代表，除了批判希利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同盟對這個運動採取的極左教派的錯誤立場外，並為這個運動提供了一個有系統的革命政綱（見「希利帶着社會主義勞工同盟往何處去？」），此外，對一九七一年發生的智利革命和一九七四年發生的葡萄牙革命，中國托派代表都對它們做了戰略性的建議（見彭述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為智利革命致國際執委全會的信，以及一九七六年二月為葡萄牙革命致國際執委全會的信）。但不幸，上述四個國家的革命，尤其後兩個國家的革命，不是從正面，而是從反面證驗了我們的分析和判斷的正確性。所以一九七四年二月列托派在意大利舉行會議時，以會議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我們，說我們保持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傳統。一九七六年三月法蘭克代表國際多數傾向（IMT）寫了一封信給我們，說他們完全同意我們對葡萄牙和安哥拉所提出的建議。這一切，難道是表示「中國托派的傳統很微弱」嗎？

關於組織的原則方面，中國左派反對派開始形成時，就在黨內堅持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以反對當時在史大林指揮下的中共的官僚集中制。因而被開除了黨籍，組織黨外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王凡西所領導的中共同盟內的少數派，一方面主張對抗戰採取失敗主義，同時要求無限制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此他們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的紀律而脫離了中共同盟，組織了他們自己的「黨」。但這個黨在50年代初即自行瓦解了。這證明：破壞民主集中制而成立的政治組織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中國革命共產黨，雖經過了無數的嚴重打擊，但由於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還是把政治和組織的生命延續下來了，並留下了一個關於「組織原則與方法」的文件（一九四八年第三次大會通過的），這個文件，一方面總結了中國托派運動過去二十年的組織經驗，另一方面，又為將來的托派運動提供一個最有價值的組織方案。

說到中國托派在敵人迫害下經得起考驗，我們只須舉出幾種事實就夠證明了。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之間，托派幹部被捕監禁者在三十人以上，除了劉仁靜、謝少安和宋逢春等表示悔過投降外，其他絕大多數都表示了堅持信仰，抵抗迫害。在一九三二年陳獨秀和彭述之等十人被國民黨政府拘捕，控告他們違反民國緊急法時，他們得到了公開審判的機會（由於社

會人士的呼籲)，他們把反革命的審判廳轉變為革命的宣講台，當衆表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指出了資本主義必然為共產主義所代替，并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對國內外的一切反動政策，宣佈了中國托派對解決當時嚴重局勢的政綱（見「彭述之的辯訴狀」，刊登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的「十月評論」）。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在中國大陸的托派被毛政府拘捕監禁者二百餘人，沒有看到一個同志公開發表悔過投降的聲明。這一切表明：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是最能抵抗迫害，最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在敵人的威脅利誘、嚴刑恐嚇之下，能夠堅持信仰、不惜犧牲一切的英勇精神，這也是中國托派最可寶貴的傳統之一。

從上面概述的中國托派在理論、政治以及其幹部在被迫害時所表現的堅決抵抗精神——這些「傳統」不但絕不是「很微弱」，寧可說是最堅強的。蘇達說：「中國支部是第四國際的最弱的一環。」從人數上說確是如此，但從思想和傳統說，中國支部是第四國際最強有力者之一，正合乎過渡綱領所說的：「在人數上雖仍微弱，但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在其幹部的無比歷煉上是強有力的」。因為在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托派像中國托派經歷過那麼多的巨大事變和殘酷迫害，中國托派的創立者們曾經親身參加過第二次中國革命的領導工作，因而從革命的上升和失敗的過程中獲得了第一手的經驗和教訓。隨後，經過了蔣介石二十年的極端反動的統治，日帝國主義佔領大部份中國時的殘暴壓迫，以及中共佔領大陸後對中國托派的毀滅性的鎮壓：這一切都在中國托派身上烙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們深切而具體地理解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日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史大林主義的中共的官僚專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後，中國托派在過去二十八年中對中共官僚專政下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變，都進行過分析、批判并預測其演變趨勢，指出了人民大眾要從此種官僚專政下解脫出來，必須經過政治革命。所有這些因素配合起來便使得中國托派「……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其幹部的無比歷煉上是強有力的」。這便替中國托派的發展「前途」準備了有利的條件，有如我們在「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所指出過的：

「不管『階段論者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甚至『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於被迫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但它的『勝利』從歷史上說是短暫的，它『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乃是以歪曲真正的不斷革命和犧牲廣大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為代價的。這就注定了它的命運將由政治革命來清算。從這一基本觀點說，

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還是要由托洛茨基主義（即真正的馬列主義）去領導的」。

如果將蘇達對中國幾個重大事變的分析和判斷，和上述的中國托派「傳統」，加以對照，便更顯得蘇達所謂的「傳統」是怎麼一回事了。例如：從一九四七年秋起，中共在蔣介石的猛烈攻擊下，迫不得已動員農民軍進行反攻時，蘇達（當時以馬基的筆名）寫道：「從群眾動員的觀點說，現時的革命甚至比第二次革命還要正常，因為後者組織起來的群眾不過一千萬，前者甚至在解放軍跨過長江以前，便有一萬萬農民起來分配土地了」。我當時曾經指出：「在第二次革命中，工人階級的最大部份不僅組織在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上海總工會等工會組織之中……，並佔領了全國運動的領導地位，發動了許多次的總罷工和示威，而且舉行了好幾次勝利的暴動，如漢口和九江的工人群眾自動地佔領了英國租界，在上海，除了公共租界外，整個的中國城市都被工人佔領了。

「在現時的中共運動中，從它開始爭奪政權起，沒有任何城市發生過工人群眾的總罷工或暴動，甚至連小規模的罷工和示威也沒有。工人的絕大多數是消極的，不活動的，他們至多對這個運動表示希望而已。這是不可爭論的事實，怎麼能夠把現時的運動和中國第二次革命相比呢？國際的決議案明白地說：「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勝利是農民暴動對完全腐朽的政權的勝利」。這就是說，中共這次的勝利不是工農群眾真正革命的政治勝利。這表明，維護國際決議的馬基（蘇達）同志走得太遠，太過美化中共所領導的運動了。此種對事變的美化不僅培養幻想，而且將引致錯誤的判斷。這兩者都是危險的，因為幻想往往導致幻滅或失望，而錯誤的判斷不可避免地要成為錯誤政策的根源（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前面所引的兩段話都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望能按照中文原本加以改正）。

當一九四九年中共推翻蔣介石的政權，建立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時，蘇達說：「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我在本文前面已批評過蘇達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內容」和「歷史任務」，因而把「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看做「無產階級專政」，將保衛資產階級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看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因而他「在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中心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已陷進極端混亂的修正主義的泥坑中去了！」

當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極端冒險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時

，蘇達（又以馬基的筆名）寫了一篇「論人民公社」的長文，在該文中特別強調人民公社的「大」與「公」，并以「大生產優於小生產的經濟學的原則」去做為支持人民公社的主要論據。我爲了駁斥蘇達這種片面的論據，詳細地引證了恩格斯和列寧關於農業集體化所定下的基本原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以對抗毛澤東的強迫農民參加公社的冒險政策，并引證了列寧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關於農業工作的報告」的話：

「我們首先所應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迫方法其實是什麼也作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完全另一個方式擺着的……在這裏採取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

我又引證了托洛茨基寫在過渡綱領中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爲了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便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史大林派底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爲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爲着官僚的利益」。

最後，我問：「他（蘇達）爲什麼在這個有關工農聯盟的基本問題上，有關五億農民的實際生活的如此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如此的矛盾，乃至放棄其原則呢？事情很明顯，他是在「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的片面固執之下」，在「公社有很大的優越性」的炫惑之下，不自覺地忽視了或忘記了「強迫公社化」可能造成的危險和惡果，因而不懂得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所起的決定作用」。（以上的引文都見「對擁護人民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

當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組織紅衛兵以攻擊劉少奇派，并經過林彪大肆宣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時，蘇達寫了「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在該文中，蘇達對文化大革命雖然作了一些有價值的分析和批判，但他對毛澤東的思想却作了如下的一般評價：

「反映在毛澤東著作裏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包含有不少的真理和進步的東西……因此，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 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有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消說還可學到一些革命的理論）。（見一九六六年十月卅日出版的「嚮導」）。

把中共脫離工人階級單靠農民武裝奪取政權的運動譽之為比第二次革命還要正常，把中共一九四九年勝利後所建立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看做「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忽視「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而單以「大生產的優越性」去擁護冒險主義的人民公社政策；把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說成爲「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上面這些對重大事變的看法和他藐視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如主張解散 RCP 以遷就二十五年前破壞民主集中制分裂出去的兩個人，和他們建立新的領導機關），以及他個人經不起考驗（如一經被捕即供出了我們護照上的姓名）等結合起來，或者這就是蘇達自己的「傳統」吧。但這種「傳統」不但和中國革命共產黨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完全相反的，這正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和蘇達之間的根本分歧的所在。對蘇達說，如果他「今後想打開前途（托洛茨基主義的前途），必須從頭做起」！

結束語

從前面「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所揭露出來的蘇達的思想傾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實質上是親毛的。因而他對中國革命共產黨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盡量加以醜詆和中傷，說它的「思想基礎」「脆弱」，「傳統很微弱」，組織「早已名存實亡了」，領導「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老幹部……的身體和精神都已衰老，能力上却幼稚非常」……總而言之，中國革命共產黨，在蘇達看來，除了錯誤百出和幼稚無能外，再沒有什麼值得保存的了，這對黨是一種澈頭澈尾的失敗主義，一種拆台主義。所以凡是和他接近，受他影響的人都是反黨或脫離黨的，他的親密的同志陳與游都脫離了黨，跑到「擁毛反右」的革馬盟去了，就是顯例。

因此，我們不得不向蘇達作最後的忠告：如果他自認爲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忠實地爲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服務，而不是蓄意拆散它的話，那他就必須進行一次最嚴肅的自我檢討，首先解答我們對他的批評，以此澄清他的親毛思想，我們將拭目以待。

附錄：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

蘇達同志在他的「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革命階段論者的中共如何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後，曾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中國不會產生一個自覺信奉不斷革命的工人黨，由它領導革命勝利呢？誰要是知道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次日，就有一部份中國共產主義者接受了不斷革命論，以後一直爲它奮鬥，他就更急於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蘇達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那些早已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托派），雖然掌握了正確的革命戰略路線，有了正確的綱領，但是沒有成熟到懂得客觀形勢具體地運用革命策略和選擇每時期最實際的工作。反動的年代不能增加他們的經驗和提高他們的政治能力，反而使長期關在小圈子裡的他們滋長一種孤芳自賞，憤世嫉俗的宗派主義心理。因此在抗戰期間和其後的內戰期間，他們都會有正確的戰略路線，却限于一般的宣傳工作，反覆背誦不斷革命的公式，而不會努力去和中共領導下的廣大群眾鬥爭建立聯繫（在抗戰時沒有參加敵後武裝鬥爭，內戰時沒有真正積極支持解放戰爭和土改戰爭，沒有利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這樣，他們就始終站在革命邊緣上，幻想在客觀的主流之外，掀起一個革命，對大事變只有批評而沒有行動，完全談不到積極影響事變，更談不到爭取領導權。所以中國革命一方證明不斷革命論（客觀革命的規律）的偉大力量——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于被迫走不斷革命的道路，它所有違反這路線的政策都令革命和它本身遭受到打擊和腐化；另一方面也證明僅僅掌握到革命理論而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也不能起作用的。正因爲中國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上身上。」（原稿五一—六頁）

我們姑且承認蘇達同志在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 and 答覆的問題，甚或是具有歷史意義和重大教訓的問題。但異常不幸！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却縮小成爲「中國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身上」，假如這個「答案」是對的，則由此得到的教訓是什麼呢？詛咒「不斷革命論信徒的幼稚無能」吧！歌頌「階段論者的中共的成熟有能」吧！這便是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邏輯「結論」！！

如果依照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方法，人們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正因為世界革命（不斷革命的最高發展）的信徒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幼稚無能，才讓建設社會主義成功的責任落在『一國社會主義者』（階段論的發展者）的史大林官僚身上」！

何以蘇達同志在其對「中國革命的回顧」，即檢討第三次革命的全部經驗和教訓中得出如此荒謬的，至少是「幼稚」得可笑的「結論」呢？首先，而且主要是：他對於像中國第三次革命這樣一個歷史大事變，像「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這樣奇特事件，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世界規模的特殊條件中去尋求其客觀的原因，却自限于從中共的具體政策上，特別是從中國托派「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策略」上，即它的「幼稚無能」上來找尋「答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驚人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這還不等於不從蘇聯的落後和孤立中去尋求當時左派反對派「失敗」的客觀原因，而僅歸罪于它「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策略」的「幼稚無能」，是同樣荒謬的主觀主義嗎？

凡是歷史唯物論者，對於巨大的歷史事變（包括革命與戰爭）的評斷，首先必須追尋其客觀原因，以此估計其可能的演化，從而得出其教訓，這已成了馬克思主義的ABC。關於脫離城市工人階級單靠農民武裝的「階段論者的中共」竟能領導第三次革命達到勝利的客觀原因，我在「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中曾根據不可爭論的事實作了頗為詳細的分析和說明，其結論或「答案」如下：

「毛澤東依靠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勝利，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特殊條件綜合下所促成的。這種特殊條件的基本點便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于極度的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的自動崩解，僅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衰朽和解體之一個極端的表現。另一方面，史大林官僚依靠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并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空前擴張其勢力和影響，這便大大吸引了在資本主義極度衰朽和解體下而陷於無出路的群眾，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群眾，這便促成這些國家的史大林黨特別強大起來，毛澤東黨正是這類史大林黨登峯造極的典型。再加上美帝國主義當時在國際局勢（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局勢）中不

利的地位，而被迫放棄對蔣的援助或對毛的干涉；同時，蘇聯因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在滿州所取得的特殊地位，并以此為根據給蔣政府以極嚴重的損害，直接援助毛澤東黨，使後者的落後的農民武裝趨于現代化。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毛黨單純依靠農民武裝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

」

由上面這個結論得出的教訓是：

「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不能單靠農民武裝力量，必須由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去完成——這——基本觀念，即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例如在印度，我們仍然要堅持印度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舉行暴動去摧毀國大黨的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落後的印度順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發展的道路。……但同時我們必須理解：像中共這樣脫離工人階級而專靠農民武裝所取得的勝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種下許多極難克服的障礙。我認爲了解這點，對於我們評斷和估計中共領導的整個運動和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當然，我前面分析中國第三次革命所作的結論及由此得出的教訓，只是一般性的，但如果我們不是從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整個世界局勢的特殊條件去了解中共領導第三次革命達到勝利的客觀原因，我們便無法進一步了解具體事變的發展和教訓。蘇達同志的基本錯誤恰在於：他把中國第三次革命從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整個局勢中孤立起來，因而不但把中共勝利的原由歸之于它的具體策略的「正確」（例如蘇達說：「抗戰時期中共以武裝鬥爭爲主，而且相當獨立發展自己的軍隊，那是正確的。……後來不顧史大林的壓力，保持自己的武裝力量……終於發展成全國的解放戰爭，也是正確的」，）而且主要地歸之于中國托派的「幼稚無能」，這還不是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嗎？

假如蘇達同志是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發，他便應當這樣地提出問題：「爲什麼早已接受了不斷革命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掌握了正確戰略路線，有了正確的綱領的「中國托派，在將近二十年中始終陷於小組組織狀態，而且是極微小的組織狀態，而不能形成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黨，「由它領導革命達到勝利

呢？」
利，反
的。正
變」，
個問題
，甚至
的托洛
大
發生和
後的環
惜犧牲
基主義
的傳統
西方和
權利益的
利而奮鬥
了各國共
用十月革
國共黨，
的迫害（
這便大大
受了不斷
義的革命
的LSSP
黨又恰因
：全世界
爲群眾黨
能」來解
織之所以
織都是「長
賞，憤世嫉
命策略和選
果真如此，
同志的主觀
度的悲觀主
如果就
壓迫和中共

呢？」因為只有成爲群眾的革命黨，才有可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反之，一個微小的革命組織根本談不到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的。正確地答覆了這個問題，則中國托派之不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也就不難理解了。但要正確地答覆這個問題，不僅不能從中國托派的主觀上的「幼稚無能」去尋求，甚至不能單從中國本身的環境去尋求，而必須在世界範圍內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的鬥爭中去探究其根源。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是從反史大林主義運動的過程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史大林主義乃是一個工人國家在孤立和落後的環境下的特有產物。它代表着蘇聯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不惜犧牲十月革命的一切傳統而替這個階層的特權服務。托洛茨基主義則代表國內及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堅持十月革命的傳統，以此向特權官僚層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但正由於西方和中國革命的不斷失敗及俄國的落後性，致使代表官僚特權利益的史大林篡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權，剷除了爲十月革命勝利而奮鬥的整代老布爾塞維克及後起的革命青年，並進而排除了各國共黨內的革命領袖，篡奪了共產國際的領導。隨後則利用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蘇聯的物質基礎及已經史大林主義化的各國共黨，在全世界範圍內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迫害（包括造謠污蔑、毆打、綁架、暗殺及公然屠殺等）。這便大大阻礙了「正統馬列主義者」，繼承十月革命傳統「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掌握了正確革命戰略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組織直到今天還未能形成爲革命的群眾黨，除了錫蘭的LSSP（新社會平等黨）之外。而LSSP之得以形成爲群眾黨又恰因爲該黨是在錫蘭共黨產生之前成立的。由此充分證明：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除錫蘭外）直到今天還不能成爲群眾黨，絕不能拿它們不懂得「運用具體策略工作的幼稚無能」來解釋。如果根據這樣的論據來解釋各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之所以不能形成群眾黨，便等於說，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都是「長期關在小圈子裡，……不知不覺地滋長一種孤芳自賞，憤世嫉俗的宗派心理」，「不懂得客觀形勢具體地運用革命策略和選擇每時期的實際工作」，而變得「幼稚無能」了！果真如此，那麼托洛茨基主義還有什麼希望和前途呢！從蘇達同志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評斷所能得出的便是這樣的一種極度的悲觀主義的「結論」！

如果就中國托派來說，它所受到的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殘酷壓迫和中共的污蔑與迫害，遠遠地超過了其他國家（蘇聯除外

的托派遭遇。因而中國托派不但絕難形成爲一個群眾的黨，且因此經常發生內部的爭吵，不斷陷于分裂，乃至不斷發生背叛（叛徒告密等），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托派能夠堅持「不斷革命論」，「掌握了正確的戰略路綫」，保持了「正確綱領」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但爲更具體更確切地了解中國托派過去所經歷的艱險及其所以不能形成爲群眾黨，而始終陷于小組組織狀態，「不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便必須檢閱一下它的全部歷史。因此，特將我們的運動分期地給以簡括的描敘如下：

第一期，一九二九年至三一年五月，這是中國托派運動發生及各派（那時共有無產者社、我們的話、十月社和戰鬥社四派）對立的時期。在這期間內，各派除了關於國民會議和第三次革命是否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的爭論外，主要是互相攻擊，這種攻擊大大地削弱了托派對於吸引黨的幹部的影響（關於這方面，碧雲在評王凡西自傳中有較詳細的敘述），這可以說是最混亂的時期。這種混亂狀態，由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的統一才算告一段落。但統一後不到兩星期，統一的領導機關大部份成員被捕，而那些爭取領導地位而沒有達到目的的英雄們，不是叛變（這次被捕正是由於叛徒的告密），便是消極了。這樣，剛統一起來的托派不但不能前進，反而在沉重的打擊下往後退了。首先就是不少黨員離開了運動。

第二期，一九三一年五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這是重新整理組織和向外發展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由於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我們會出版了一個公開刊物（名「熱潮」）在黨內及群眾中積極進行了宣傳與鼓動，因而爭取了黨在上海的一部份幹部，爭取了許多工廠支部，并由此建立不少新支部。到一九三二年秋天，老黨在上海的大部份工人支部都轉到我們方面來了。這是中國托派運動第一次建立工人基礎的一個時期，并由於我們的組織具有工人基礎，所以我們領導了許多次較大規模的罷工，并獲得了相當的勝利。同時，由於我們的公開刊物鼓動反對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共正式領導對十九路軍抗戰所採取的極端教派主義態度，贏得了不少工人群眾的同情和一部份學生青年的擁護。這情形表現托派運動正在上升，大有向前發展之勢。但這個發展的前途被國民黨的迫害打斷了——這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彭述之等整個領導層的被捕（這次被捕也是由於叛徒的告密）。

第三期，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這時期可以稱之爲組織殘破的「冬眠時期」。自陳獨秀等被捕後

，我們的運動完全失去了領導，隨後不久，上海最積極負責的幹部（上海各區委聯合會的委員）又全部被捕。於是「九一八」以來所建立的一切工人支部（那時工人支部三十餘個，包括黨員二百餘人）都失去了指導和聯系，幾乎全部離散了，從此我們的運動便進入了「冬眠狀態」，因為最積極的領導份子和幹部都被投入國民黨的監獄中，絕大部份的黨員不是離開，也是消極了。這種「冬眠狀態」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發生為止。

第四期，一九三七年「八一三」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可以說是我們運動復活和重新發展的時期。由於「八一三事變」的爆發，國民黨政府在日本猛烈進攻之下，迫不得已進行抵抗，因而不得不釋放政治犯。這樣，被監禁的托派份子獲得了「自由」，其中一部份如彭述之，劉家良等得以重新投身運動，恢復組織，在上海建立了中央領導機關。另一方面，由於抗戰的刺激，以前消極或不活動的份子都在各地方自動地形成了組織，從事活動（如廣東的中山、香港、廣西、溫州、山東和北平等）。於是托派運動又復活起來，而且向前發展了。再加上我們在這時期內，除了按期出版「鬥爭」外，並還出版公開刊物「動向」，並出版一批小冊子，特別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蘇聯現狀與前途」，「過渡綱領」及「俄國革命史」等，這便大大地擴大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和思想影響，加速了我們運動的發展。

但這個時期內，除了史黨拚命造謠，以「托派漢奸」污蔑我們外，我們內部亦發生了兩次嚴重的思想鬥爭，即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意因連根的極左教派主義的鬥爭。前一鬥爭雖在組織上沒有引起嚴重的糾紛，但由於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他之公開散播機會主義的思想及申明他不再屬於托派，曾給了我們的運動以極嚴重的打擊。後一鬥爭經過了一年以上的激烈爭論，由於教派主義者完全漠視組織原則，終於自動脫離，導致分裂。而且這種分裂又是在極度嚴重的時期，即太平洋戰爭剛爆發時發生，這便給了組織以很大的損害。這次分裂跟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結束了這一時期。從此我們的運動陷于極黑暗的境地。

蘇達同志指責說：「在抗戰時沒有參加敵後武裝鬥爭」，他這種指責，是出于完全不了解當時組織的具體情形。我在前面已說過，我們的組織是在「八一三」事變後才重新恢復起來，差不多一切都得從頭作起。首先是必須建立中央領導機關，與各地方新成立的組織建立聯系，並在工人中重找關係，盡可

能出版機關報和迫切需要的小冊子、書籍及公開刊物等。在這種情形下，在組織還很微小（黨員數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還不過百餘人，且多是年輕學生），有經驗的幹部極少的條件下，當然沒有可能有系統地去「參加敵後的武裝鬥爭」，因為武裝鬥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組織沒有達到相當嚴密的程度，並且有相當數量的黨員和幹部（此外還有交通費等），是無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的。否則便是軍事冒險。關於這一點，當時組織內部確發生過意見分歧。陳獨秀主張不管有無組織和政治路線，必須首先參加武裝抗戰。因此，他曾在武漢聚集一批幹部（如連根、樸亦凡等），並與某些軍人接洽，企圖介紹他們去「參加武裝鬥爭」，但都沒有成功。此外，中山有位老同志（姓陳）自動地組織一些農民進行「武裝鬥爭」（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的影響），但所得到的結果是一個慘敗，且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山東方面一些同志也自動「參加了敵後武裝鬥爭」，但也遭到了同樣的結果，並且是在中共游擊隊攻擊之下喪失生命的。這證明一個十分微弱的革命組織，要想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往往是得到相反的惡果。

當時從監獄中出來的我們，在抗戰的情況下，並不是沒有注意到或不懂得「參加敵後武裝鬥爭」的重要和必要。但認為要直接參加武裝抗戰，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首先是重新建立黨的領導機關，出版機關報，在政治上確定我們的抗戰方針，與新成立起來的各地組織取得密切聯繫，在城市工人中建立關係，然後才有可能有計劃地把組織擴展到農村，從事農民運動，以此作為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的基礎。但這不是一下辦得到的。當一九三九年我們的組織稍上軌道的時候，我們曾在浙江某地從事農民運動，嘗試組織武裝鬥爭。但由于種種的複雜的原因，首先是組織的微弱，缺乏幹部，我們這一嘗試也就成了流產。由于這次流產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深深感到我們的組織力量太薄弱，還沒有能力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在當時還只能在政治上批評國民黨抗戰的反動政策，宣傳抗戰的正確方針，鼓動群眾自動武裝進行抗戰等等。爲了在最近將來實行「參加武裝鬥爭」，我們還得發展和加強自己的組織。但太平洋戰爭一爆發，我們的全部計劃都被破壞了。

第五期，一九四一年末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這是我們運動陷于最困苦的黑暗時期。由于珍珠港事變的爆發，日帝軍隊立即佔領了上海租界，這便迫使我們的中央機關與各地組織截斷了一切聯繫。不久上海又遭到一次大破壞，最積極的一部份幹部被捕，印刷工具被沒收。中央的負責人陷于最可怕的危

害中（他們已失去了住所，過着流浪生活）。留下來的少數幹部也得轉移他地，這樣在上海的組織，也因日軍的佔領和控制而解體，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得遷移別地，以圖生存。因而在這一時期中，在日帝直接統治的區域內，我們已無法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活動。我們所能作的只是發生個別影響，爭取某些可靠的同情者，為未來的復興運動作準備而已（例如彭在這時化名當教授，影響了一些左傾的學生，并與同情者保持密切的聯系，這些聯系便是「和平」後得以大規模出版刊物的資源）。

第六期，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八年，這是運動復興的時期。由于戰爭的停止，敵偽統治的崩潰，蔣政權還沒來得及在「收復區」鞏固其嚴密統治。我們乘着這個時機，首先在上海集合離散的同志，恢復組織。特別以全力出版公開刊物（如「求真」和「青年與婦女」）以此公開傳播我們的思想和政治影響，并藉此作為一面旗幟，在全國範圍內把久已分散的托派份子和同情者吸引到它的下面來。因而在很短的時期內，各地的組織如香港、廣州和溫州等都恢復了。不久并獲得了新的發展，同時新的組織也開始形成起來（如南京、武漢、山東等區域）。雖然如此，我們的力量還很微弱。尤其在客觀局勢迅速發展，一般群眾對國民黨的反對和腐化統治的憤懣，國共衝突和內戰的急劇發展之下，我們的力量顯得遠落在事變的後面。因而我們除了在部份的學生青年和極有限的工人群眾中散佈一些影響，推動罷課罷工的鬥爭外，對於整個群眾運動無法給以「積極的影響，更談不到爭取領導權」。尤其對於農村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我們更無力量去影響它們。事實上這些鬥爭都是在中共直接指揮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我們是馬克斯主義者，不是光說大話，放空砲之徒，我們只能腳踏實地，按照我們的能力所作到的為限。就這一點說，我們那時總算盡可能履行了我們的職責。假如事變不是發展得那樣急劇，假如我們獲得更多的時間，我們是有可能發展成為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黨，因而有可能「積極影響事變」，甚至「爭取領導權」的。但客觀的發展終于打斷了（就歷史說，還是暫時的）我們運動在大陸上的進程。這或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整個運動在歷史上的「厄運」吧！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在這時期內沒有犯過錯誤。但我們的錯誤并不是像蘇達所指責的：「不會和中共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建立聯系（……內戰時期沒有真正支持解放戰爭，沒有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而是對整個事變，特別是對中共單靠農民奪取政權的估計。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指出：

「我們黨對於中共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整個事變估計上的根本錯誤，便派生出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估計上的錯誤；以及某些對外宣傳上的策略性的錯誤。因而影響我們黨對整個事變的態度或多或少趨于消極方面的批評，而低估了它在客觀上的革命意義。這是應當鄭重地予以糾正的。但如我在前面所說過，我們的錯誤并非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的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見我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如果要更具體些說，我們最大的錯誤在於：從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國共談判完全破裂，中共已被迫決心反攻，公開提出了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繼續以前對它的批評態度，這是一種極錯誤的宗派主義，是不能容許的。那時我們應當採取的立場是：站在中共方面積極號召工人群眾起來摧毀國民黨的統治，要求中共號召工農兵群眾組織蘇維埃，在城市實行組織工人起來配合農民軍的進攻。而我們還沒有這樣做的錯誤根源，正由於我們死死抱住了那個原則：在現代社會城市支配鄉村的條件下，農民武裝如得不到城市無產階級的直接領導，是不能成功地摧毀資產階級的政權的。但我們沒有注意和了解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條件下有可能促成依靠農民武裝的中共走上政權。蘇達同志在他大談中國托派過去的錯誤和教訓時，竟完全沒有提到這點，這證明他對於過去事變的發展還是一個外行。

至於蘇達說：「在內戰時期沒有真正支持解放戰爭……沒有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這樣說，是抽象的。只有當中共實行與國民黨決裂（實際是與它自己的幻想決裂），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政府的口號時，我們站在前者方面實行鼓舞工人群眾起來摧毀後者，才算得「真正積極支持解放戰爭」，才算得「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即令如此，中國托派還不能因此便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因為我們組織力量實在太微弱了，與事變的發展距離得太遠了。這只能表示：在政治上，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中國托派最後採取了一個正確的立場。

從前面全部歷史的簡單描敘，便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A，中國托派所處的極度艱鉅的環境，它所遭到的國民黨的殘酷迫害和史黨的無恥污蔑，使它在二十年間不但陷于小組組織狀態，而且這樣小組組織本身亦不斷為白色恐怖特務所破壞，所中斷或陷于分裂。這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最受迫害和痛苦

的一個革命組織（蘇聯的除外，事實上蘇聯早已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存在）。

B，這樣一個最受迫害和痛苦的革命組織，在二十年間，特別是「在抗戰期間和其後的內戰期間」，「都有正確的戰略路線」（蘇達的評語），並保持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在多次被反動統治的特務破壞之後，又重新抬起頭繼續前進——這一切所表現的堅決、勇敢和犧牲精神總是值得自豪的，在全世界所有革命黨運動史中不可多得的。

C，中國托派過去當然犯過錯誤（不犯錯誤的革命黨是沒有的），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中共推翻國民黨政權時所犯的錯誤極為嚴重。但這種錯誤不是原則性的，反而是過于拘泥原則。因而完全忽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殊局勢，這是值得注意，應從其中獲取教訓的。

D，像這樣長期陷于小組組織狀態的中國托派，要指責它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是完全不懂得我們的運動所處的客觀環境及其遭遇和本身演化的過程，是一種純粹主觀主義或唯心論的武斷，且是極幼稚的武斷。

E，不管「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甚至「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于被迫要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但它的「勝利」從歷史上看來還是短暫的。它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乃是以歪曲真正的不斷革命論和犧牲廣大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為代價的。（註）這就注定了它的命運，將被政治革命來清算。從這一基本觀點說，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還是要由托洛茨基主義者去領導的。

「註」關於中共歪曲不斷革命，詳見彭著「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一文中「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與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這裏僅指出：蘇達斷定中共「終于走不斷革命的道路」是不正確的，因毛澤東的「一國共產主義」正是澈頭澈尾違背了不斷革命的國際主義的。

史大林主義，已因史大林的繼承者宣佈了它的破產（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大會上的秘密報告），波匈革命更在行動上敲響了它的喪鐘。現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史大林主義和整個資本主義一樣，已到它臨死掙扎的時候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史大林主義不過是一種臨死掙扎的昏亂表現而已（毛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運動便是這種昏亂冒險的典型），而托洛茨基主義，正由于史大林自行宣佈破產，已開始從被壓迫和被污衊的孤立狀態中脫離出來，向建立群眾革命黨的道路走去，近年英國和

日本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預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雖然受盡了迫害和污蔑的痛苦，但他們所「信奉的不斷革命論」仍然是一種最堅強而正確的武器。這種武器不但可以揭露中共利用不斷革命之名來辯護其階段論之實的種種荒謬措施（如以不斷革命論辯護人民公社的冒險政策等），而且是一個指南針，它將引導中國工農群眾走向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獨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並進而與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群眾消滅史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完成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走向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理想世界——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我應當說，蘇達同志對於問題的研究是認真的。例如他對人民公社研究所寫的文章（「論人民公社」）以及對整個革命的檢討的文章（「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都表現他確是在認真地思索問題。但他有一個嚴重的弱點，就是：他對問題的看法不是太片面（如對人民公社，他強調了它的「大生產的優越性」，却輕視了「農民自願原則」的決定性），便是太抽象或太主觀（如前面所指出的，對中國托派運動的具體歷史事實既極少知道，便作出它的「幼稚無能」的結論）。這種弱點多數是由于對唯物辯證法的不夠理解和運用。但缺乏實踐經驗或太注意具體事實，亦是構成他的弱點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希望他以後研究問題時，除了注意活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外，假如不能多參加實踐工作，至少要多研究具體的事實，接受別人的實踐經驗，這對他會是有益的。

彭述之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